

DARK LIFE AND BRIGHT LIFE

黑白人生

十三年新疆
服刑记

李晓光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
任
编
辑

黑

文
珍

I247.53

(W)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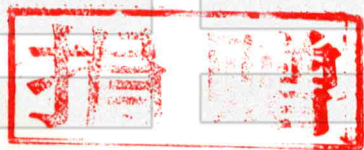
X10-0782383

十三年新疆服刑记

黑白人生

李晓光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10-0782388

黑白人生
——十三年新疆服刑记
李晓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呼图壁八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插页 310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7—228—04860—1/I·1811 定价:20.00元

目 录

引 子	(1)
远离故土情依依	(4)
同室操戈	(9)
调犯总动员	(25)
最后的探视	(41)
重犯专列	(44)
踏上新疆的土地	(65)
一群未上笼头的“骡马”	(76)
官小难当	(96)
天上掉下的馅饼	(108)
初入学苑	(123)
鹬蚌相争	(135)
羞为人师	(145)
一次漂亮的偷袭	(158)
中考告捷	(175)
危险的“游戏”	(181)
拉边套的人	(187)
来自《中国青年》的消息	(190)
梦中惊魂	(194)

芳心初动·····	(200)
远方的来信·····	(208)
三大悲剧·····	(218)
出了一点儿意外·····	(230)
情场惊变·····	(239)
荷尔蒙太重的人·····	(247)
天机终于泄露·····	(255)
再入囹圄·····	(261)
度日如年·····	(276)
良药苦口·····	(289)
相会在狱中·····	(301)
想做好人,可惜忘性太大·····	(305)
越狱“谋略”种种·····	(308)
百怪千奇狱中案·····	(315)
悠闲的二分队·····	(328)
爱心不减的傻骆驼·····	(335)
劳动“体验”·····	(340)
“玩笑”引出的案件·····	(344)
我当了“狱头儿”·····	(348)
只缘立功心太切·····	(355)
拾棉激情·····	(362)
一波三折·····	(370)
柳暗花明又一村·····	(374)
尾 声·····	(379)
后 记·····	(388)
出版说明·····	(390)

引子

1996年9月15日，我正坐在由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七十次特快列车上。在经过十二年零八个月的牢狱生涯后，我又踏上了回东北故乡的路。

1984年5月13日，当我坐在一列装载了八百名东北调犯的重犯专列上驶往新疆时，我绝不敢奢想会有今天的一幕。那时候我的身份，还是一个被判处“死缓”的重刑犯。八百名犯人中，如果说我与其他犯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我的头上还有着一顶在当时说来较为罕见的光环——我是1982年毕业的“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

然而，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保不准你在哪一步上就会出现一个闪失。1983年5月29日，我在辽宁锦州的家中，将前来上门寻衅的洪石杀死，由此而犯下重罪。转眼之间，由一名刚刚任教不久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坠入到罪犯的行列。

我不敢说我的犯罪是无辜的，但其中的确有无辜的因素。被我失手打死的洪石，曾是锦州城里的一霸，因我的妹妹拒绝了他的“追求”，他便一次次的寻衅威逼。有一次，竟持刀将妹妹拦截在我家的楼下，用刀在妹妹的脊背上划伤三处。妹妹迫于无奈，一度躲避去了外地。

1983年5月29日这天，妹妹刚刚回到家中，洪石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又携刀闯到我家挑衅。当时，我与二哥、堂弟小留都在

家中，在经过一场争吵之后，双方动起手来。情急之中，我操起一柄榔头，砸向了洪石……

洪石死了。

1983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严打”运动。一大批地痞、流氓纷纷落入法网。然而这一次，我也随着风头正劲的“严打”，走上了法庭。

一审下来，我被判死刑。后经上诉，改为死缓。

在这场全家性的灾难中，二哥被判无期，堂弟小留被判无期。此后，我们兄弟三人，开始在锦州服刑。

1984年5月，随着往边疆调犯行动的开始，我被解往新疆服刑。

在新疆服刑期间，鉴于我大学毕业、案情特殊、农场中学缺少教师的情况，我被抽出做了脱管的代课老师，由此一干即是九年。

教学之余，我潜心于《语言的起源》一书的写作，此书经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及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专家的鉴定，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91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我叙述自己经历的文章。由此引出了我一生中最意想不到的姻缘——毕业于东北某大学的一位本科毕业生秀妹，在与我取得联系后，远涉万里，也来到了我服刑的农场学校，与我一起教书，等待着我的服刑期满。

患难人生，最显至情。因秀妹的到来，我的人生履历中，平添了另一种色彩。

1996年2月12日，我在数次减刑、数次立功之后，终于告别了犯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故乡锦州。

在我归来之后，《锦州日报》《锦州晚报》《辽宁日报》《新疆日报》《齐鲁晚报》《金陵晚报》《作家文摘》《深圳青年》《妇女杂志》《今日杂志》等许多报刊都报道了关于我和秀妹的通讯特写。作家白雪生、鲁一伟根据我和秀妹的传奇经历创作的广播剧《追寻绿洲》，

先后在锦州人民广播电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方电视台也根据我和秀妹的经历拍摄了电视新闻故事。

1996年,《中国青年》杂志的彭明榜博士在采访我和秀妹之后,撰写了《大漠深处的苦恋》,发表于该刊1996年第7期。

我要感谢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我的经历以及对我与秀妹的经历所作的客观报道。但同时我也明白,任何人的叙述都不会与我自己的叙述相同。对此,我抱有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凭借的不是文字上的功底,而是凭借着十几年塞外大漠劳改生涯的经历,凭借着我在艰苦的劳动改造中流过的血与汗。在这些真实的记录中,我不希望我的笔下有一丝的矫揉造作,我只想把我的经历一五一十、客观地道出。

对于电网高墙外的普通公民们来说,高墙之内的那片方寸之地是陌生的,人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一点儿神秘。

尤其对于犯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每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对他们的陌生,每次公审会上犯人的囚车被众人围观的场面,似最能说明这一点。

任何犯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存在心理上的残缺,这是我想在我的书中最想表述的一点。

感谢新疆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高兴先生的约稿,使得出版社方面的构想与我的写作初衷产生了令双方都感到非常愉快的不谋而合。

当然,更应该感谢的,还应该是花钱买书、看书的读者。在这里,我惟一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读者在阅读过此书之后,绝不会惊呼上当。

最后,我还想告诉读者——你们在读过此书后,对高墙之内那个原本陌生的环境,尤其是犯人们存有的各种心态,你们将不会再觉得陌生。

有这样两点收获做保证,我想读者诸君尽可以放心了。

远离故土情依依

刚进四月份，犯人们纷纷传说要往边疆调犯人了。

犯人最喜欢传播小道儿消息，也许是犯人们生活太寂寞，太无聊，也许是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总之，在监狱这个“方寸”之地，小道儿消息最有市场，一传十，十传百，各种消息总是不胫而走。

犯人们传播的小道儿消息，十有八九是子虚乌有。听这类小道儿消息，几乎等于听吹牛大王们的“历险记”。说实话，有时对于那些千奇百怪的小道儿消息，我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消息的制造者们丰富的想象力，倘若这些人能把这种“才能”用到正道上，我们国家的文学画廊里由此平添许多力作也未尝可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小道儿消息也许就成了真的，而且真到了与以后的事实完全相符的程度。

比如往边疆调犯的消息，很快就成了事实。时隔不久，南山监狱果真就调出了第一批犯人，目的地是新疆。当时狱方还组织我们收看了关于这批调犯的电视新闻。

工艺设计室的曹大胖子就是第一批被调走的。

进入九月份，犯人中间又传开了第二批调犯行动将要开始的消息，甚至连时间也说得非常准确，说是五月七日。

五月六日晚上，整个号筒子里人心惶惶，沸沸扬扬，有人说各大队负责管教的队长晚上压根儿就没下班，看样子夜里也不回家

了；有人说看见监狱里运进了一箱又一箱的啤酒罐头，好像是为管教队长们做夜宵用的；还有人说各大队调犯的名单已经确定，这会儿就贴在办公室里……

晚饭放风的时间我跟张道礼在一起，边走边聊。

“都说明天调犯，也不知道准也不准？”我问张道礼。其实，我心里似乎已经是早有“感应”。

张道礼说：“咋会不准呢，我不但听到，而且还看到了。”

“你看到了啥？”

“你瞧今晚这筒子里，有半个管教队长的影子吗？”

他说得不错，这还真是个反常现象。

我沉吟片刻，像是自言自语，“不知道这回有没有我……”

“我看还是做点儿准备好。”

“你听到什么消息么？”我说不上心里是悲是喜，总之是极不平静。“说不准……不过看你这阵儿在工艺室好像没站稳脚。”

张道礼分析得有道理。

夜里，我躺在床上，思前想后，脑子一刻不停，做着各种各样的分析……

自二月末来工艺室，已经两个多月了，可一件露脸的事儿也没做过，跟同室犯人们的关系却搞得一塌糊涂。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犯人们的这张嘴，捧你时可以甜言蜜语把你捧上天堂，损你时又可以咬牙切齿把你贬入地狱。背地里，我在他们嘴里，已不知下过多少回地狱了。我给管教队长的那份汇报效果也未必会好，说不定，管教队长心里兴许会把我想成一个爱多管闲事的“事儿妈”，而且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以后说不准会有多少麻烦事呢！

真让我走，我也就潇洒地走吧！

其实想开了，走，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人挪死，树挪活，这个让人烦闷、窒息的工艺室我其实早就不想呆了……整个晚上，我几乎

没有合眼，满脑子里都阿 Q 似地想着离开这里的好处……

张道礼让我有所准备，也许他已经知道了实情，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可我又能做什么准备呢？不过一个行李卷儿而已……

后来，我迷迷糊糊地忽然被一阵尖利的哨声惊醒了，我揉着眼睛爬起来。这时，天还没亮，只听到有人在黑暗中叫了一声：“嗨，要调人啦！”

“谁喊的？瞎喊什么？穿好衣服都给我往外走，被子一会儿回来再叠。”门外传来郑队长的声音。

出了号筒子，四处传来一片口令声，各大队都在集合待命。

郑队长在让犯人们报数之后，宣布说：“队里的犯人将有所变动，凡是喊到名字的，都出列到前面来。”

整个过程在一个月前，大家已经历过一次，凡点名出列的犯人也并不都是要被调出的，有的只是帮助调出的犯人收拾行李。

郑队长开始宣布名单了。

“任天虹、韩振华、吴永年、李晓光……”

名单中果然有我。可我是帮助别人收拾东西，还是别人帮助我收拾东西呢？那一霎，我的脑子整个一片空白，时间在那一霎似乎戛然静止了。

“任天虹、韩振华，你们俩帮助李晓光收拾行李，吴永年、李晓光跟着杨工程师到工艺设计室，把李晓光留下来的工具验收一下。”

我能感觉到周围犯人们的目光此时都在注视着我。一个月前曹大胖子调出的时候，大家对他就是这样一种目光。我甚至能感觉到在这些目光中所蕴含着的各种不同的含义，有欢乐的，有怜悯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毫无表情，不关痛痒的。

半个小时之后，我和一大队调出的二十几个犯人站到了一起。这时，我的行李已被值星的犯人倒腾到了行李车上。此时，我身上所带着的，只有一副手铐。

手铐虽凉，但为我戴手铐的年轻警察给我戴手铐时动作很轻，而且戴好之后又提了提铐链，颇为善意地问了一句：“你看紧不紧？”

碰到这样的“政府干部”，你心里只有感恩的份儿。我忙连声说：“不紧，不紧。”

“要是紧的话，你就吱声。好几百里路，六七个小时呢。”

六点整我们被押上了囚车。因为人多，恐怕出错，上囚车时是点着名儿一个一个往上上。到车内落座之后又点了一遍，等到锁定车门临开车时，又点了第三遍。

囚车终于开动了。

从中心岗到监狱北门的路两旁站了上百名警察，犯人们这时早已撤回了监号。囚车鸣着警笛，缓缓地驶出了监狱的北大门。

当囚车驶出北大门时，我邻座一个瘦小枯干的人冲着地面连呸了三声，口里嘟哝道：“他妈了个巴子的，真不吉利！”

“怎么不吉利？”我小声地问。

“你不知道这儿的规矩？”瘦子从沮丧中还没有缓过来。

“规矩多了，可不知是哪一条？”我说。

瘦子带着老到的表情告诉我说：“活着出去的走东门，死了的才他妈的走北门呢。”

我没有再吭声，木然地坐了好一阵儿。虽说不太相信这些，但一旦听了，心里毕竟还是有些腻歪。

我们这一行共有三辆囚车，两辆行李车。出了狱门之后，又有两辆满载着武警的汽车和一辆吉普在外面候着。吉普车在前面开路，车顶上架着机关枪的两辆武警的汽车则一前一后夹着囚车，最后才是行李车。

我知道我们这是要被押往沈阳集结，然后再由沈阳转乘火车往新疆。这种程序，在不久前的电视新闻节目里已有过报道。沿着这个思路，我想，去沈阳必经锦城的解放路，而我家就在解放路

边，如果车队从那里路过，我不仅可以看到家里的阳台，说不定，兴许还会看到家里的人……这种念头一经涌出，便足以让我兴奋不已……

囚车终于进了锦城，而且不出所料，果然又拐上了解放路。过了西大桥，所有的建筑都是这样的熟悉，这样的亲切。这是我从小成长起来的都市，在这条大道上，甚至哪一处有个凹坑，我都闭目能详。更何况，这里，还有我的亲人……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自觉地模糊起来……

离别故乡的依依之情深深地笼罩着我，我感到自己就好像一片枯叶，被风吹着，不知飘向何处……

随着囚车的行进，我多少回梦中的家终于在视线里出现了……除了家中的阳台，门窗，我还看到了因鸣叫的警笛而蹒跚着出到阳台上的我那头发灰白了的父母亲，自从我出事之后，我们全家人对于警笛声已变得特别的敏感。然而此时，我却不能不从心里感谢这悦耳的警笛声。爸，妈，再见了，你们的老儿子不能在你们身边，你们可得要好好地保重身体啊！……我不停地拭着泪水，自言自语地在心里说。

家渐渐地远去了，我的心情却好久平静不下来。我想起幼年的我，被母亲牵着手走路的情景……想起假期开学前，父亲检查我作业的一幕……假如时光能够倒流，生活能够重新开始，该有多好啊……

车队驶出锦城，飞驰在郊外望不见尽头的柏油路上。这时，郊外正是莺飞草长的暮春时节，碧绿的田野，蔚蓝的天空，以及窗外不断变化着的田畴、村舍……看着那些在田野里劳作的人们，甚至那些在农舍的屋檐下悠闲的晒着日头的老人，我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

自由——只有在失去了它之后，失去者才能真正感觉到它的价值。

同室操戈

调犯的车队驶进沈阳大北监狱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下车后摘下手铐点过名，我们就被移交给沈阳大北监狱入监队的队长了。入监队的队长点着名将我们一百多号人分成四个组，每组四十人上下，然后我们按秩序被带进大北入监队一幢三层楼房，我们这一组的四十多人被关进了五号牢房。

五号牢房是一楼东侧最里面靠南面的一间，房间挺大，约一百平米的面积，还是地板地。在监舍的西墙一侧，还搭有二层铺，铺上铺着草垫子，照着硬地板比，那又算得上是上等铺了。隔着窗户看五号房时我就想，这么大一间号子只关四十多个人，尽可以横躺竖卧放开腿脚睡觉了。可是事与愿违，队长一打开房门就对号子里正等着我们的两个值星员颁布了命令：“把这四十二个人排好，每人暂时只给个坐的地方，一会儿抚顺、营口、凌源的还要来呢。”

怪不得行李没让带进来，看来我们只能穿着衣裳坐着睡觉了。

队长开始往号子里数人，两个值星员就像往笼屉上码饺子一样码人，一个挨一个，不留一点空隙地排着坐。两排码齐了，当码到第三排的时候，四十几个犯人中出现了一个“刺儿头”，他说什么也不肯当第三排的排头，因为那排头的位置正对着号里厕所的门。两个大北监狱的犯人值星员岂是好惹的吗？侧面站着的那个抡起巴掌就打了“刺头儿”一个“满脸花”，“刺头儿”立刻口鼻窜血……

正面那个也没见血手软，照着“刺头儿”的小腹又添了一脚，“刺头儿”被踹翻在地，扭曲着身子打着滚儿。

一个值星员骂道：“你他妈的没听见政府是咋说的？这大北监狱是你撒野的地方？”

另一个值星员骂道：“你他妈的不坐这儿就关他妈你小号，这是你家呀，你说住哪儿就住哪儿？”

这时节四十多号人早已都进来了，队长也已锁上了门，号内的事儿全凭两个值星员发落。

挨打的“刺头儿”躺在地上撒起赖来，两个值星员上前又要拿脚踹。

这时从后排里走出来一个长得像狗熊一样的胖子，他帮着解围说：“算了算了，我坐第一个，让他坐到后边去。”

狗熊胖子说着就席地坐在厕所门跟前。

两个值星员就坡下驴，停了手脚，嘴里却仍不干不净虚张声势地骂个不停：“今个儿算你捡着，有人替你担着呢。”

“这贱货，你不日他妈，他不管你叫爸爸，你说他短练不短练。”

号筒子里两个大值班的大概也听见了号里两个小值班的喝斥咒骂，这时捋胳膊卷袖子地也来到铁窗前，其中一个壮如公牛的家伙隔着铁窗如狼似虎地吼着：“他他妈的起不起来，他不起来就把他拖出来，整到小号里去。”

趴在地下的“刺头儿”不敢再趴窝，就爬了起来，他的鼻子仍在滴血，眼睛和嘴巴一会儿时间就肿胀得变了形。

一个值星员上前把他拽到水池边去洗。

外面大值班的仍不依不饶：“你这种×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咋地，弄了个满脸花舒服了？”

“刺头儿”往水池子里擤着鼻血，唾着吐沫，敢怒而不敢言。

坐位排完了，两个值星员爬到二层铺上，虎视眈眈地盯着坐在地板上的四十多个人，这场景使我想起了动物园里的猴山，猴王经

常蹲在山头上，鸟瞰他的猴群。监狱劳改队是个颇为特殊的地方，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你要靠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循规办事根本行不通，“大拳头政策”相反却非常好使。监狱劳改队所使用的犯人值星员，大多数是敢打敢冲、说打就动手的主儿，以暴还暴，以恶还恶，以毒还毒，以狠还狠，如果队长用我这样有点儿文化，喜欢跟人讲道理的人当值星员，不仅他的指示贯彻不了，每月他还须把我带到医院里透透视，再为我买些伤筋动骨的跌打药。俗话说“人善人欺，人恶人怕”，这话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是有些道理，那放在犯人群体中那可就是千真万确了。

狠、毒、敢下手，这是监狱劳改队犯人们最为敬畏的一种素质，你要是不狠、不毒、不敢下手，在犯人群体中你就多少有些被动，如果你成年累月置身于犯人群体，那你就会经常遇到麻烦。每个犯人如此，跟犯人成年累月打交道的管教队长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他心慈面软，完全按照监狱法规的各项原则去管犯人，他不管不住犯人，犯人甚至会要犯上。十余年的监狱生涯，类似的情形我听到、见过不少。

现实生活工作中，理论往往脱离实际，理论是一个系列，现实是一个系列。理论的系列，人在生活工作中可以不理睬它，而现实却要求人们面对它、正视它。种种清规戒律在现实中并不好用，可人们仍把它写在书本里或放在嘴边，长此以往，理论的东西往往形成一个空洞，人们对于理论条文的轻视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了毒、狠、敢下手之外，巧用心计也颇为重要，如果确有诸葛谋略，在犯人中间你也能混得不错。

这不，坐在二层铺上的值星员招呼起狗熊胖子来了。

“哎，坐在厕所边上的，你叫啥？”

“韩长禄。”

“来来来，你上二层铺上来，厕所门口那儿咱就不住人了。”

韩长禄出了人群，呼哧呼哧地爬到二层铺上，他平步青云，一